



适时重新思考全球化及其规则

Time to Rethink Globalization and its Rules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俄 乌冲突的后果提醒我们，全球经济不断面临不可预见的混乱。我们已经吃过很多次教训。没有人预测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几乎没有人预测到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病毒大流行或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导致美国转向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即使是那些确实预料到这些危机的人，他们也无法准确说出危机会何时发生。

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了巨大的宏观经济后果。疫情使我们发现，看似强劲的经济缺乏韧性。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连口罩等防护装备这样简单的产品都生产不了，更不用说检测试剂和呼吸机等更复杂的产品。这场危机加深了我们对经济脆弱性的理解，重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当时仅雷曼兄弟一家公司的破产便

导致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濒临崩溃。

同样，俄乌冲突正加剧食品和能源本已令人担忧的价格上涨，可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那些在疫情防控期间债务飙升的国家。欧洲经济也因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而非常脆弱，德国等主要经济体无法快速或廉价地摆脱这种资源。许多人担心这种依赖导致对俄罗斯恶劣行径的容忍，这是有道理的。

事态的特定发展是可预见的。十五年前，笔者在《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中问道：“是否每个国家都愿承担安全风险，作为提高全球经济效率的部分代价？欧洲能否简单表示，如果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最便宜，那么就应该从俄罗斯购买，而不管对安全有何影响？”不幸的是，欧洲的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国际公司税改革独立委员会成员，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7—2000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碳价格高级别委员会联合主席，系1995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评估》主要作者。原文出自<https://www.theasset.com/article/46459/time-to-rethink-globalization-and-its-rules>，经香港《财资》杂志授权编译，译文文责由本刊负责。徐恒革编译。



答案是为追求短期利润，忽视显而易见的危险。

当前缺乏韧性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及其所支撑政策框架的根本失败。市场本身是短视的，经济金融化令其更加短视。市场没有充分考虑关键风险——尤其是那些看似遥远的风险——即使后果可能是巨大的。此外，市场参与者知道，就像上面列出的所有危机一样，出现系统性风险时，决策者不能袖手旁观。

正是因为市场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风险，所以对韧性的投资太少，社会成本最终会更高。通常建议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迫使公司承担更多的行为后果来“定价”风险。同样的逻辑也要求我们为温室气体排放等负外部性定价。如果没有碳价格，就会有太多的污染、太多的化石燃料使用以及太少的绿色投资和创新。

但为风险定价远比为碳定价困难。虽然通过其他选择——产业政策和法规——可以使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使得增强韧性的干预变得更加困难。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是理性公司寻求在完全有效的市场背景下最大化其长期利润的幻想愿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制下，公司应该从最便宜的来源购买，如果个别公司未能适当考虑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风险，政府不应当干预。

诚然，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包括一项国家安全豁免，欧洲当局本可以援

引该豁免来证明干预措施是合理的，以限制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多年来，德国政府似乎是经济相互依存的积极推动者。对德国立场的宽容解释是，德国希望通过商业能够驯服俄罗斯。但长期以来，腐败的气息一直存在，集中体现在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其执政期间是德国与俄罗斯加深纠葛的关键阶段，之后施罗德前往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就职。

现在的挑战是建立适当的全球规范，将等级保护主义与对依赖和安全问题的合法反应区分开来，并制定相应的系统性国内政策。这将需要多边协商和谨慎的政策设计，以防止类似特朗普利用“国家安全”问题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征收关税等恶意举动。

但重点不仅仅是调整新自由主义贸易框架。在疫情防控期间，WTO知识产权规则禁止在世界许多地方生产疫苗，由此造成数千人不必要地死亡。病毒不停传播，获得了新的突变，变得更具传染性，并对第一代疫苗产生抵抗力。

显然，人们对知识产权安全的关注过多，而对经济安全的关注过少。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思考全球化及其规则。我们已为当前的正统观念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在的希望在于记取本世纪重大冲击的教训。^[N]

学术编辑：曾一已